

間。作者概括了15世紀理學與經世之學並行的思想趨向，繼而用一批個案研究了理學學者對出處問題的思考或學思歷程，探討了部份學者的經世思想與實踐，並對一批天主教徒士大夫的信教過程乃至理學思想進行討論。從這些豐富的個案中，可看出15世紀的丘濬以《大學衍義補》探討「治國平天下」之學的努力、陳白沙對出處問題的考量及白沙身後江門學派的分裂；可看出16世紀黃佐等具有獨立性的學者在主流學派之外探求新學術取向的努力，以及葉春及、呂坤等經世學者的思想及事功；還可看出17世紀早期部份士大夫何以接納西方宗教，並如何調適天主教與理學的觀念。這些研究豐富了學界對近世中國思想史之複雜性的認識，亦揭示了明代思想界中多彩的學術取向、學派傳播、分合情形以及一批士人念茲在茲的出處問題。

本書既反映了作者從其所揭示的思想史研究進路入手所取得的成果，也指出了多方面可供繼續探討的新空間。如作者所言，目前其研究「還在積累個案，等待總結」（〈總序〉，頁6）。因此，更多的深入個案研究當有助於學界對近世中國思想史形成新的整體了解。對於《大學衍義補》的反應性著作，作者研究了湛若水的《聖學格物通》。若能對《大學衍義節略》、《中庸衍義》、《皇明繩武編》、《皇明世法錄》等《大學衍義補》的反應性著作及其作者進行充份研究，或可對明儒的「上層」經世思想在明中後期的演變情形產生新的認識，並探究當16、17世紀的明帝國面臨着與15世紀不同的政局與危機時，受《大學衍義補》影響的儒者曾提出過何種應對時局的方案。

孫天覺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吳琦、趙秀麗，《明代「問題皇帝」研究：一項基於社會類群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390頁。**

中國二千餘年的帝制時代，很少有一個朝代如明朝般持續出現「問題皇帝」：身居九重卻不履行皇帝的職責，行為荒誕、怪異、叛逆、怠政、嗜酒、縱欲、貪婪（頁24）。他們中有慵懶怠政，乃至幾十年不上朝的；離經叛道，自甘為大將軍、小木匠的；酒色財氣，鬧得民不聊生的；殘暴任性，將文武大臣杖責致死的。從明代民間對他們的稱呼可見一斑：「蟋蟀皇

帝」、「充齡天子」、「風流天子」、「木匠皇帝」、「獨夫」……（頁27）以「土木之變」為分水嶺，明王朝由盛而衰，與此相照應，英宗之後歷任也無一例外淪為「問題皇帝」。這些皇帝能否作為一個社會群體進行考察？「問題」體現在哪些方面？他們為何出現嚴重的角色失範？對社會、歷史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此，吳琦、趙秀麗的新著《明代「問題皇帝」研究：一項基於社會類群的考察》作了很好的剖析。

該書突破傳統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和人物傳記的局限，從制度、人物與社會的多重角度出發，全面系統地探討明代「問題皇帝」。全書共10章，既是大明王室的眾生相，又是明王朝的另類診斷書。全書分三個部份：第一章為第一部份，分析明代皇帝的群體性特徵與「問題皇帝」之表徵。作者簡要勾勒了明代皇帝的執政群像圖，認為「問題皇帝」都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缺乏責任心，掙脫制度與角色的規範，因而在思想認識、行為實踐各方面，與賢君明主的要求相去甚遠。第二至六章為第二部份，為全書重點，主要探討明代「問題皇帝」生成環境。作者從生存發展環境、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制度環境以及統治集團內部關係等諸多層面，抽絲剝繭、條分縷析的闡述問題皇帝的產生原因。成長環境不佳、皇位繼承制度缺憾、皇儲教育失敗、制衡機制缺失、臣屬之誤、祖制之弊等一系列因素，導致很難培養好皇帝，皇帝也很難當下去。第七至10章為第三部份，從王朝命運、政風士風轉變、社會大眾生活、文學藝術四個方面，分析問題皇帝對國家與社會的影響。可以看到，這些常被譏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帝王們，對社會歷史的客觀影響廣泛而深遠，遠不是所謂「天高皇帝遠」那麼簡單。

該書綜合運用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多學科方法，引入社會類群和社會角色等理論，善於透過個案抓住個體特徵和內在屬性，雖然研究對象是明代「問題皇帝」，涉及國家和政治的最高層，卻不限於皇帝個體和王室，而是將其與國家、制度、時代、社會結合起來，宏觀視野與微觀考察兼而有之。比如，分析問題皇帝的生成原因時，熟稔運用心理史學方法，首先從儲君生存環境入手追根溯源。作者指出，明代皇帝在繼位前，幾乎無一例外遭遇種種險惡，面臨父親的漠視猜疑、缺失母愛、宮廷明爭暗鬥，甚至血腥迫害。成長於缺乏關愛、飽受排斥的緊張壓抑環境中，導致很多儲君性格畸形，存在明顯的身心疾患；登基後卻不思改變，對後繼者同樣刻薄寡恩，陳陳相因，悲劇循環上演。

作者善於抓住制度與人性、個體與群體、傳統與變革的多重維度，宏大敘事與個人敘事相結合，通過考察「問題皇帝」，透析明王朝乃至傳統政治

運作的深層次問題，比如皇位繼承制度、祖訓祖制、皇權制約機制等。明代在制度建設方面頗有建樹，達到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新高峰。這些龐雜的制度，保障了明王朝統治的長期穩定，然而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弊病，也帶來負面影響。比如，明太祖廢除丞相制度，導致皇權與相權的嚴重失衡，內廷與外廷矛盾重重，使後繼君主不堪重負，走上荒政怠政之路。明太祖苦心孤詣地編制繁瑣嚴整的祖訓家法，精心編織了獨攬大權的政府，還有強大的文官制度、嚴密的監察系統、暴戾的特務組織。他天真而武斷地要求繼位者和天下臣民遵循祖制，「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頁157）。然而，不僅「使得皇帝成為繁瑣制度束縛下的困獸，處處受限，動輒得咎」，也使「官員百姓面對紛繁的詔令無所適從」（頁156）。事實上，從惠帝開始，明朝就不斷在糾正和維護各種制度的紛爭中徘徊。由於皇帝普遍不願意屈服於制度、禮儀、規範與臣民的意願，自然成為「問題」皇帝。殊不知，這些制度、禮儀的羅網本身也是問題多多。明代是最堅持嫡長子繼承的王朝，皇位繼承超穩定，即便帝系變更也有序可循，代價是皇儲普遍素質低下、缺乏競爭意識和進取精神。美國科學史家薩洛韋(Frank J. Sulloway)在《天生反叛》(曹精華、何宇光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一書中提出，個人傾向於激進或保守，其決定因素存在於家庭內部(即個人的成長環境，尤其是出生順序，從而形成的個性)，而不在於各個家庭之間(即社會經濟地位)。明代死守「無嫡立長」、「兄終弟及」原則，皇儲多為長子，保守和暴虐的種子似乎一開始就種下了。

該書視野廣闊，涉及面大，既有綿密透徹的深度剖析，也不乏言人所未能言的神來之筆。旁徵博採大量筆記文集，採摭宏富，卻徵引精當，無累贅感。該書還有一個重要的學術旨趣，對當前的社會史進行「補註」和批評。如作者所說，「社會史作為一種學術範式，應該是學術研究的一種素養，包括眼光、方法、理念等，這些都應該融通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所以社會史絕非僅僅是研究領域的下移」。(頁388)馮友蘭提出，研究工作有「照着講」和「接着講」之分。本書有不少「接着講」的地方，理論提升的精妙論斷隨處可見，但沒有流於就事論事，更沒有宏大的理論框架。比如，全書以較大篇幅揭示明代皇帝與通俗文學的發展傳播、藝術風格演變、服飾時尚互動的關係。從中可以看到，「他們雖隱居九重深宮，影響力卻波及宇內。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庶民百姓，或大或小都受其影響」。(頁26)單純從底層或區域研究歷史，尤其社會史，勢必存在偏頗。同時可以看到在宋明理學和

正統說教之外存在另一番場景，皇帝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豐富多彩。他們是人而不是「神」，這也許正是問題所在。

當然，該書中也存在不夠嚴密或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對「問題皇帝」的界定，有時指英宗之後諸帝，有時涉及所有明代皇帝。明代皇帝與王朝命運之間，似乎存在一種悖反——糟糕的皇帝與成功的皇室、偉大的時代。如賀愷所說，明王朝是「最穩固和最不受人挑戰的統治王室，而其制度也大部份被後繼的清代以贊許的心情繼承下來」，「明代政府總的說應該算是同時代世界上最成功的龐大的政府」（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下卷，頁8、92）。明王室諸皇帝問題多多，惡性循環，卻能享國近三百年；明王朝經歷風風雨雨，卻長期穩定並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臻於中國歷史之高峰。為什麼存在這種局面？該書的分析並不充份，給讀者留下了繼續思考的空間。

黃永昌

湖北汽車工業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526頁。**

18世紀正值中國康雍乾盛世，中國的社會經濟蓬勃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18世紀以後急轉直下，社會發展持續地疲軟衰敗。因此，18世紀中國的財政問題成為眾多經濟學者討論之重點。與眾多側重國家財政層面的學術研究不同，此書以皇室財政為重點，亦即主要側重討論內務府的收支情況。雖則皇室之中，「家事即國事」，內務府庫的動支與國家財政息息相關。但與以戶部為代表的國家財政層面不同，內務府庫收支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更大的彈性空間。在中國傳統社會的背景下，觀察和研究這些徘徊在制度內外的人和事，更有助於了解制度真正的運作機制與現實情形。

本書主要從兩個部份探討18世紀乾隆時期的皇室財政。第一部份主要從地租、關稅、生息銀兩和鹽務幾個方面對皇室財政收入展開討論。皇室的收入來源於較長的積累過程，經過順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幾代的經營，才形成乾隆時期較為成熟的體系。與國家財政不同，田賦始終不佔皇室財政收入